

# 赫维茨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启示

## ——纪念赫维茨百年诞辰

陈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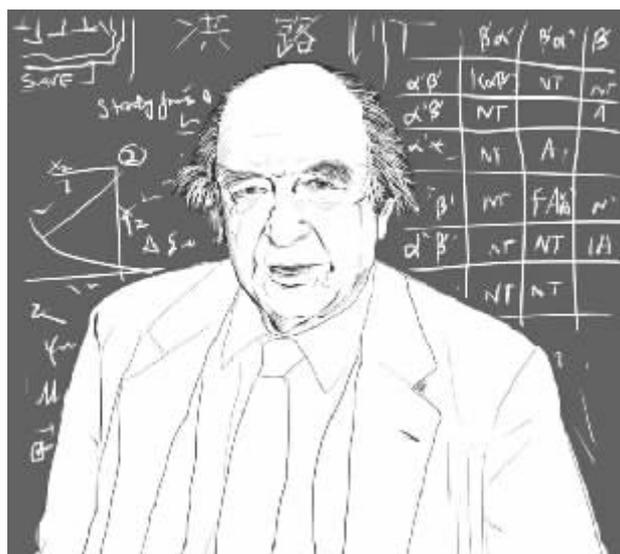
赫维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趣浓厚,他多次造访中国,以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教育、促进中国经济学家赴美交流等方式,助推了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这一过程也逐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解。

2017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利奥尼德·赫维茨百年诞辰。赫维茨是过去一个世纪里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由其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所发展出或使之得到丰富的主要经济论题,几乎涵盖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各个方面。阿罗更是在其论文集一般均衡卷中将赫维茨视作对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四大主要贡献者之一。1990年,赫维茨曾因“在现代分散配置机制理论上的先驱性工作”获得由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颁发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至今为止,美国也只有8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其他7位分别是赫伯特·西蒙、乔治·施蒂格勒、肯尼思·阿罗、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无不是经济学巨匠。

赫维茨在其后半生对中国保持了极大关注,这缘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成就。尽管他的经济思想非常深刻,但由于他的著述大都用到较为高深的数学工具,与经济现实的联系看起来没有那么直接和紧密,所以在中国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不过,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认和体制机制转型的推进,对于由经济机制设计的知识和政策需求而驱动的理论 and 思想传播还是逐步深入和扩展开来。尤其是2007年赫维茨与马斯金、迈尔森一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赫维茨以及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传播,运用其经济思想和理论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学术文献也逐渐增多。

### 赫维茨经济思想的中国传播回眸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蓬勃发展,这吸引了赫维茨的注意,他对中国及其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利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 1917-2017)

制图/陈韶旭

济改革的兴趣越来越浓,曾于1980年先后两次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表达自己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近况的强烈兴趣,并就自己所从事的机制设计理论研究对于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等目标实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在信中,赫维茨发出了盛情邀请,欢迎中国学者、官员到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大学就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进行访问交流,同时也表达了希望受邀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的意愿。并且,他还给出了一个意向性演讲题目:“计划、激励与分权:经济效率与社会目标”,这与当时中国的改革主题是非常吻合的。随后几年直至21世纪初,赫维茨多次造访中国,通过各种途径促进了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赫维茨致力于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教育,多次赴华开展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设计方面的讲学。1984年6月7日至7月24日,赫维茨通过中美“高级学者交换计划”来华访问。他先在当时的华中工学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活动;后又在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做了6场学术报告,主要内容有《资源的有效分配》《分散化》《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均衡的稳定性》《有约束条件的最

大化》《资源分配机制的激励作用》等。(参见刑鲁《美国赫维兹教授来华讲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4年11期)在讲座中,赫维茨表示,新古典经济学对当时情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有帮助,但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帮助可能更大,而他在这些讲座中要讲的正是一些分析经济问题的数理方法和技巧,它们有助于“研究经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和后果”(利奥尼德·赫维茨《经济机制与资源分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1985年第7期)。此次访问中,赫维茨与中国社科院的一批著名学者如于光远、许涤新、王宏昌、徐绳武等建立了联系。

受赫维茨所做系列讲座的启发,王宏昌在1984年发表了题为“关于经济系统论和经济系统分析”的论文,其中就指出“西方有很多经济学家把现有经济系统看成是给定的、不变的,只研究在这个系统中人、财、物的流量及其相互关系,而不研究经济系统本身是否合理。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如美国科学院院士、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教授认为经济系统是可以研究的、可以改进的、可以设计的”。这段评介将赫维茨机制设计理论对于传统经济学的颠覆性贡献做了明白无误的阐述,同时也

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外源理论的支持。王宏昌还将这篇论文寄给了赫维茨,感谢后者对于自己研究的启发。

1985年,赫维茨受邹至庄教授之邀为由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举办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福特班”首期(1985-1986)学员上过微观经济理论课程。首期学员中包括陈勇民、哈继铭、唐晓政、栗树和、金中夏、赵耀辉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这全国10所高校的49名学员,这些学员在赫维茨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曾联名写信给他,祝贺其获奖。整体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改革风云际会、开放方兴未艾的时间区间,思想上的解禁、解放扫除了许多学术上的理论禁区,这就使得赫维茨到中国的学术交流成为可能。

其次,赫维茨也多次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家赴美交流,并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系培养了多位来自中国的学生。比较知名的学生有范良信(1966届博士,2016年8月过世,原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科林斯堡校区经济系终身教授,曾任教于堪萨斯州立大学经济系)、田国强(1987届博士,现任美国得州A&M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洪露(1991届博士,现为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金融系教授,曾任职于美国雪城大学经济系)、栗树和(1994届博士,曾任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和金融系副教授、SAP中国公司首席代表)。这些学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赫维茨的经典著作也经由他的学生翻译向中国国内推广。

1986年,赫维茨在写给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形容他为什么致力于推动邀请中

国青年经济学家赵明尼苏达大学访问研究:

我非常热心于此,是因为我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做一些贡献,同时也是因为中国经济是我的研究兴趣。

赫维茨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来帮助自己更好地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他还表示,自己当时主要是借助阅读《China Daily》来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希望对方能够帮助提供一些其他了解渠道。事实上,赫维茨也通过阅读其他报纸(并做了很多剪报)或借助评审期刊论文的渠道,加深了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在他的论文或著作藏稿中有不少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包括了钱颖一、许成钢、林毅夫、易纲、洪永淼等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其中许多复印件都上附他的研究批注。

正是基于持续不断的学术交流,赫维茨的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在中国得到一定的传播。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宏昌在一系列论文中对赫维茨的有关经济思想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宣传其关于社会经济系统可以分析、设计和不断改进的思想观点。1986年,王宏昌借用赫维茨1972年发表于《东欧经济年鉴》的《经济过程中的集中与分散》一文所创设的经济学语言,来讨论自1979年开始就讨论许久的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已明确了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但真正用现代经济语言来探讨二者关系的论文不多,王宏昌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一文中介绍了赫维茨这套分析框架的优势,“由于经济生活十分复杂,我们需要有一种描述它的语言,以便执简驭繁,认识和探讨它的某些重要内容”。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当口,王宏昌在另一篇论文《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又将赫维茨的